

山西大家長

閻錫山特力獨行

● 郭榮生

留學日本入同盟會

閻錫山（一八八三—一九六〇）山西五臺人。字百川，號龍池。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年）生。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步兵科畢業。武昌起義成功，閻氏響應革命軍在太原宣布山西獨立，民國成立，任山西都督，嗣任省長，實行鄉村自治新政，馳譽中外。民國十六年任革命軍北方總司令，與奉軍作戰。全國統一後，任內政部長，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兼山西省政府主席。抗日戰爭爆發，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屢敗日軍於晉北等地，後轉戰於晉西南山區，愛國愛鄉，被山西人稱為山西大家長。民國三十八年隨中樞至廣州，出任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嗣轉任總統府資政。民國四十九年卒於臺北。著有中的哲學、世界和平與世界大戰、中國政治文化與人生、中國政治與土地問題、三百年的中國、大同之路等書。

光緒卅年，閻錫山廿二歲，畢業於國立太原武備學堂，畢業生共一百二十人，清廷

遴選二十名為公費生，送往日本學習陸軍，閻錫山是其中的一名。臨行前，山西巡撫張曾敷及藩台、臬台、學台、道台五大憲，諄諄告誡，萬不可與孫文的革命黨交往，應避免接近，專心學習，畢業後報效清廷。

閻錫山初到日本，因臨行時清廷官吏告誡有言在先，心存拒斥，不願與革命黨人來往，但逐漸由所聽到的言論，與所閱讀的書籍中，感到滿清政府的腐敗無能，誤國太甚，對清廷官吏吩咐的話全拋到腦後，決心參加推翻滿清的革命運動。

光緒廿一年八月廿日，中國革命同盟會在東京成立，便加入同盟會。入盟之後，孫中山總理剴切指示，學軍事的同志，不可參加校外活動，以保身份的秘密。但應在校內建立純軍事同志的組織，負責籌劃實施革命行動的任務。此一組織取孟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為大丈夫」之意，定名為「鐵血丈夫團」。

參加盟員廿八人，山西有閻錫山、溫壽泉、張瑜及喬煦等四人。其他為浙江黃郛，

江西李烈鈞，陝西張鳳翔，雲南李根源，湖北朱綬光、孔庚等，都是辛亥前後的革命中堅人物。

鐵血丈夫團成立後，積極從事地下工作，進行革命事業。光緒卅二年，閻錫山廿四歲，奉孫中山之命，偕同盟會盟友趙戴文（趙畢生襄贊閻錫山，後為山西省主席），各攜炸彈一枚，返國佈置華北革命。至上海港口時，聞知海關檢查甚嚴，經閻錫山巧妙佈置，將所攜炸彈，藏在身上，面不改色地接受檢查，終能鎮靜從容，平安過關，閻錫山的膽識過人，於此可見一斑。

回山西後，在家僅住五日，即至五台山周圍各縣與雁門關內外旅行，秘密考察關內外形勢，擬在五台山建立革命基地，歷時三月，返還日本。為革命事業奔走而忍心割捨個人家庭溫暖，閻錫山大公無私的胸襟，令人欽佩！

喚起人民愛國熱忱

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閻錫山廿七歲

，自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六期步兵科畢業，繞道朝鮮返國。行經漢城時，適逢朝鮮大臣下朝，只見朝鮮高級官員等，人人沿牆壁小路而行，每行數步，即轉頭向閻錫山窺視，如鼠之畏貓。直到住旅館後，朝鮮記者來訪，知閻氏為中國人，乃細說原委，因閻錫山身著西服，與日本人無多大分別。閻錫山見朝鮮官員之可憐模樣，即知其平日在路上，常受人凌辱，以故不敢坦行，亦未敢直視。

至平壤，見一嶄新大樓，經詢問，知為妓女學校。閻氏當時深感亡國之民，其生命、財產、人格、廉恥，均不得自保。故於辛亥革命成功後，大聲疾呼，向山西人民講述亡國之可怕可痛。並提出「亡國之民，不如喪家之狗。」「救國要在國未亡之前」兩句警語，寫在各縣通衢大街及各學校，以激發人民的愛國心。並為使省民目睹亡國慘狀以自警警人，曾發動山西各界人士，組織朝鮮參觀團，前往考查朝鮮亡國實況，以所得慘痛事實，編印出版「朝鮮見聞錄」，散發全省人民，普遍宣傳亡國之可怕，喚起人民的愛國熱忱。

任京津衛戍總司令

國民革命於民國十七年六月六日收復了北京天津，上午九時張作霖部的鮑麟麟退出北京（六月廿日中央政治會議決議，北京改為北平），閻錫山的第三集團軍孫楚部於六

月六日十時許，在民衆歡呼聲中進入北京，商總指揮震，率部繼至。六月八日閻錫山在保定就任京津衛戍總司令。

七月二日，何應欽在南京中央黨部總理紀念週報告稱：全國有國民革命軍八十四個軍，約三百師，兵額共計二百二十萬人以上。而且東北、雲南、四川等地方部隊，還沒有包括在內。國家全年度收入總額為四億五千萬元。須償付外債達一億元，實際可支用者約三億五千萬萬元，而其中八成以上的三億元則用於軍費。每月軍餉，最少須六千萬萬元。軍事委員會及蔣總司令希望祇留八十師，兵額一百二十萬人，俾軍費減至全國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中國人口繁多，幅員遼闊，以與歐美相較，有此數額，原不過多。惟以中國經濟落後，戰爭時間太長，產業凋零，民生痛苦，實不堪鉅額軍隊之供給。

七月三日蔣中正總司令，偕李宗仁抵北平，閻錫山迎之於長辛店。七月六日上午八時，蔣總司令偕同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三集團軍總司令及文武百官百餘人，赴西山碧雲寺，至開國名人孫中山靈前，舉行北伐完成之祭告典禮。蔣總司令伏讀祭文，回溯往事，極感哀痛。

七月十日，蔣總司令乘各集團軍總司令齊集北平之便，召開軍事善後會議，發表軍事善後意見書。「認為北伐完成，軍事急應結束，裁軍節餉，從事建設，已成全國一致之要求。」並謂「吾人顛覆北洋軍閥之後，

仍有兩種重大義務：一面當裁汰兵額，移鉅額軍餉為建設之用。一面當充實兵備，保衛國家與社會之安全。」

出席南京編遣會議

閻錫山於十七年十二月十四日由天津乘新華輪赴上海轉南京就任國民政府委員，並出席民國十八年一月一日在南京召開之編遣會議，力贊實施編遣方案，實行裁兵建設。抵京後，在中央黨部提出「裁兵為建設之先務」作公開講演，以求主張之貫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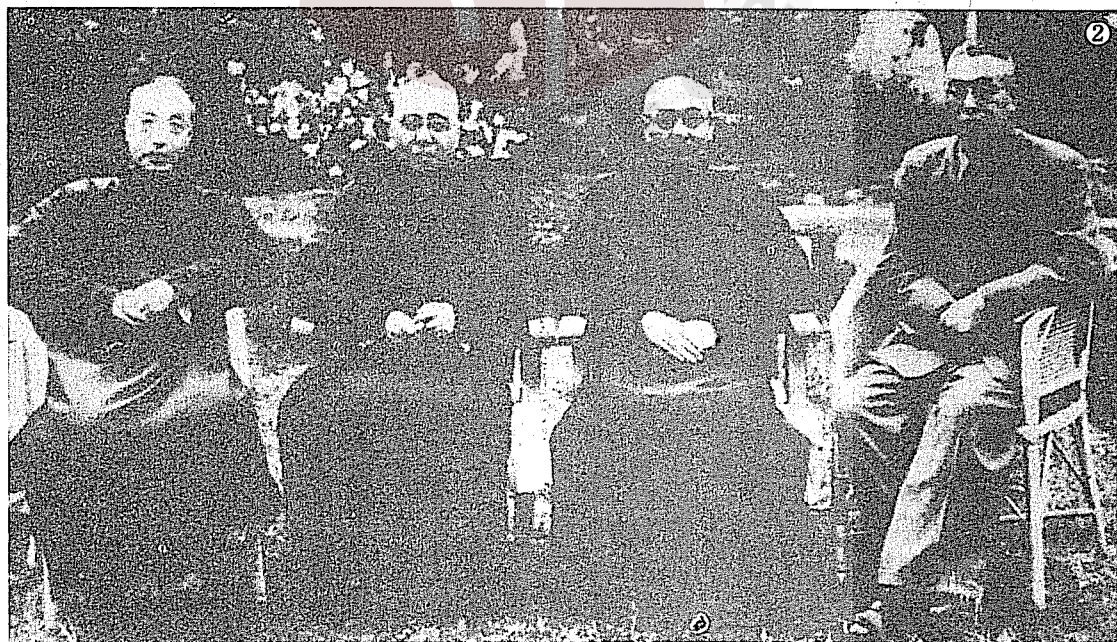
十二月十九日中央政治會議決議通過「編遣會議條例」。民國十八年一月一日編遣會議在南京開幕，出席委員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何應欽、胡漢民、宋子文、孫科等廿餘人，蔣中正總司令任主席，大會至一月廿五日閉幕，通過各項重要條例及辦法，規定編縮軍隊，改革軍制，一律以師為單位，每師三旅，每旅三團，每團三營，每營四連。師設砲兵、工兵、輜重兵各一營，而直隸於軍事委員會。現有之各軍團與各軍一律廢置。

各集團軍同時著手編遣。編遣會後，組織編遣委員會。四個集團軍總司令皆為編遣委員會常務委員，各任一個總部主任。並派定中央委員會同各集團軍總司令，分組編遣區，自十八年八月廿日起，實行編遣。全國兵額八十師，全部軍費以國家收入的百分之四十為限，各省得就編餘官兵改編為地方警



①一九四九年閻錫山（左）與蔣中正（右）在漢口妙高台合影。

②一九四九年閻錫山（右二）在南京與賈景德（左二）、徐永昌（左一）、楊愛源（右一）合影。



察保安隊，每省人數，最多以六千人為限。

閻馮發動中原大戰

編遣會議於民國十八年一月廿五日頒佈「國軍編遣委員會進行程序大綱」後閉幕，閻錫山返山西，馮玉祥回河南，李宗仁去上海。惜因編遣太過理想；不切實際，所訂辦法未盡妥善，二、三、四集團軍，紛起反對。

十八年三月中旬，粵桂將領李宗仁、李濟琛、白崇禧反對編遣會議，實行反抗。五月五日李宗仁自稱「護黨救國軍總司令」，通電作戰。第五十二師師長葉琪，第十五師師長夏威，在湖南開始軍事行動。

民國十八年五月十五日，國民軍將領劉郁芬、孫良誠、韓復榘等通電反對編遣會議，宣言推舉馮玉祥為「護黨救國軍西北軍總司令」，破壞平漢路、隴海路交通，炸毀橋樑，扣留機車，實行叛變，進軍河南，攻抵洛陽。

國民政府中央分別用兵，對粵桂之李宗仁、白崇禧、李濟琛及西北之馮玉祥，於五月下旬，分別討平。但在十九年五月初，閻馮聯軍與中央部隊開始衝突，中原大戰，首在河南商邱、亳縣開始。後漸沿隴海、平漢、津浦三鐵路，劇烈展開，至九月中旬，中央節節勝利。張學良發表和平通電，擁護中央，派兵入關，拊閻馮之背，閻馮通電下野，戰事結束。

究竟編遣會議所訂未盡妥善辦法是什麼

，居然能使二、三、四集團大為不滿，而遣兵調將，大動干戈。據徐永昌在所著「求己齋回憶錄」手抄本卷十一第三頁說：「十九年之中原大內戰，雙方動兵一百幾十萬，起因於民國十八年夏天（榮生按：應將「夏天」改為「初」）之編遣會議。在二、三、四各集團，當然願按各人現有力量之比例裁汰，尤其都希望一面按比例裁兵，一面還請中央幫助些薪餉，這是各集團軍的需求。而中央則第一是：不想幫助各集團薪餉。第二是：將第一集團與中央分開計算。別人認為一集團軍即是中央。中央認為應當是兩個單位。故在中央要按五個單位辦理，將中央與一集團算成兩個單位，別人則要算他們一個單位。此即衝突的最大原因。總而言之，不論二、三、四集團，即所有其他雜牌小單位，都想存在。而第一集團軍則不但要存在，且要擴大，以圖壓制各單位，故逼出一個十九年的大內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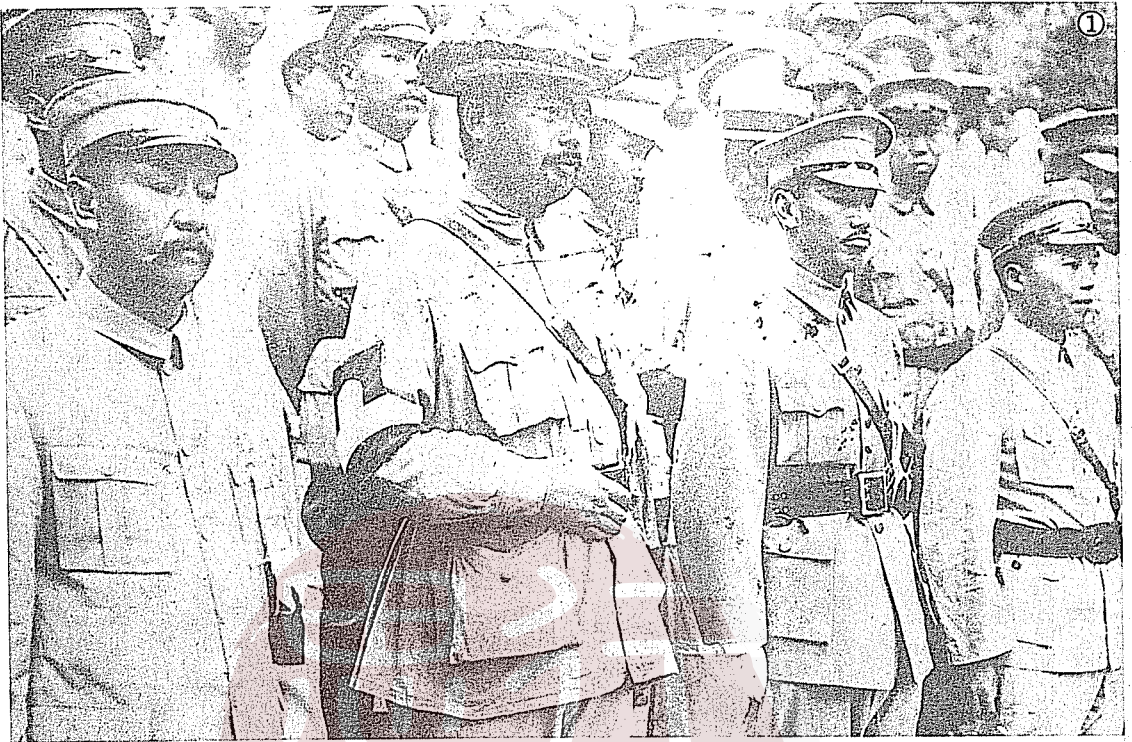
裁兵建設失敗原因

評估一件政治措施的成功與否，應從所欲達成的目的實現與否為標準。以國軍編遣會議而論，國家養兵太多，無法負擔軍費，應行裁減，這是誰也不應該反對的，就是閻錫山也贊成裁兵建設。但是實行裁減，應有方法，有步驟，選擇適當時間，公平合理，委屈求全，互商妥善辦法，不能一方逞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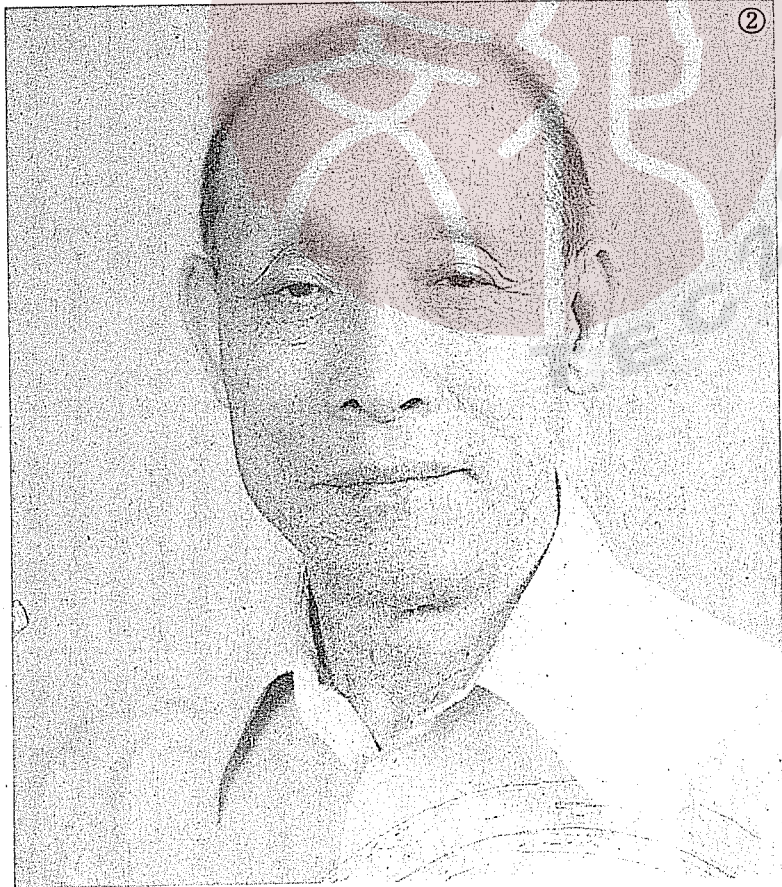
壓迫他方，也不應一方裁減，另方擴充。因為大家都是握有數十萬雄兵的首領，一言不合，便會遣兵調將，大動干戈，釀成禍國殃民的內戰。所以處理裁軍，應該極端審慎戒懼，不能發生些微差錯。如以上述標準評估民國十八年的編遣會議便發現那是一個極為失敗會議。不僅沒有達成裁軍的目的，反而激發出連綿兩三次的內戰，國家與人民所受的損失，比不舉行編遣會議還大。編遣會議所以失敗，除了前述增加集團軍的數目外，約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中央政府尚未建立起誠信威望：那時北伐剛剛完成，新成立的中央政府，還沒有建立起絕對的威望，使各地的封疆大吏，聽從中央命令，就是各省主席及省政府委員的任命，大都是由各區有力首領推薦，然後由中央照名單發表。大致的說，晉、冀、察、綏、平、津是閻錫山的勢力範圍。豫、魯、陝、甘是馮玉祥的勢力範圍。江、浙、湘、鄂、皖、贛是中央的勢力範圍。西北是馬家的勢力範圍。東北是張學良的勢力範圍。中央在這種情勢下裁軍，未免太冒失，太冒險。

二、蔣中正總司令的領袖地位尚未形成：北伐成功，是四個集團軍共同完成的。雖然蔣中正總司令，但是其他二、三、四集團軍總司令，實際上並不是蔣的部屬。所以李宗仁白崇禧敢對編遣會議首先反對，馮玉祥也敢繼起反對，最後閻、馮敢結合起來反



①



②

①一九三七年閻錫山（前排左一）與前排左二起：馮玉祥、蔣中正、李宗仁合影。
②作者郭榮生近影。

對。一個國家有外患，最容易使國人覺悟團結。自民國廿年九一八之後，日本步步壓迫侵略，國人已感到亡國的危險。再不覺悟團結，國家必亡無疑，於是全國人民，把救國抗戰的希望漸漸集中到蔣中正委員長的身上。但是到了民國廿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張學良還沒有發覺蔣委員長是全國人民一致擁戴的抗日救國領袖，所以他敢劫持蔣中正而發動西安事變。西安事變發生後，全國人民一致憤怒譴責，各地軍政領袖，無一人附和響應。這時張學良纔知道蔣委員長是國家命運之所寄託，不敢對他絲毫毀傷，送還南京。蔣委員長是全國一致擁戴的領袖，在西安事變時，表露無遺。這時日本人著急了，日本人看得清清楚楚，中國有了舉國擁戴的權威領袖，假如給中國三、五年時間，日本便無法征服中國，所以在民國廿六年便發生七七事變，日本實行提早滅亡中國。

三、時機太早：民國十七年六月六日奉軍退出關外，革命軍收復平津，六月十一日閻錫山、白崇禧進入北平，七月十日蔣總司令在北平召開軍事善後會議，即提出裁兵節餉，從事建設。軍人首即感到，北伐甫告成功，立時沒有飯吃，頗覺惶恐寒心。民國十八年一月便開裁軍會議，實嫌為時太早，雖然那時全國軍隊三百餘師，國家無法供養，但閻、馮、李的軍隊，多年以來，並未發過全餉，馮的軍隊士兵不分階級每月支餉三元，軍官不分階級每月支薪十元，以維生活。

伙食服裝統一供給，軍眷統籌安置（張守初，鮮為人知的馮玉祥軼事，中外雜誌，一九九期，七十年三月號）。中央本可暫不過問薪餉如何發給，每月發給閻馮李一筆總數，讓他們自己分配發給。拖些時間，從容計畫轉業或遣散。可惜中央不此之圖，硬行裁軍，結果便成爲「急則生變的裁軍會議」，導致國家發生三場內戰，斷斷續續打了一年多。

即以中原戰爭而論，歷時八月，雙方動員兵力超過百萬，死傷總數至卅萬人以上，支用軍費達五億元之鉅。戰區之廣，戰禍之烈，不僅北伐之役未足倫比，即民國以來之戰爭亦絕無其例。最後乃以張學良自東北出兵入關助中央軍，以拊閻馮之背，而告終結。若無此一大規模戰役之人力、軍力、公私財力的鉅額消耗，民國廿年九月十八日之瀋陽事變，日本當不致乘張學良入關，東北軍力空虛而爆發。毛澤東亦不致立足井崗山，嘯聚坐大，禍及湘鄂贛三省，編遣會議影響之深遠，無可否認。原是一項裁軍會議，竟產生這種結果，真非始料所及。

擴大會議煙消雲散

擴大會議是國民黨以黨治國的黨務糾紛問題，集國民黨內反中央勢力之大成，以改組派與西山會議派爲中堅。改組派之汪精衛、陳公博、王法勤、白雲梯、顧孟餘、陳樹人、潘雲朝。西山會議派之鄒魯、謝持、覃

振、張知本、傅汝霖、茅祖權、閻錫山之趙戴文、趙丕廉、冀貢泉、商震。馮玉祥之薛篤弼、郭春濤等均來參加，可謂反中央之空前大結合。這些人裡頭，在以後的政府機構中，位居樞要，膺負重任。

擴大會議以召集國民會議，制定約法爲號召，並主張各級黨部對政府及政治，立於指導地位，不直接干涉政務。經大會決議之黨務案件有：處理黨政之七項基本條件（包括有「不以黨部代替民意機關」，「總理遺教所謂以黨治國，乃以黨義治國。應集中人才，收群策群力之效」），籌備召開國民會議及制定約法等。所制定之約法草案，共二百一十一條，世稱「太原約法」。擴大會議雖告失敗，但廿年五月五日，國民政府於南京召開國民會議，通過訓政時期約法，六月一日正式頒布全國，則是間接受擴大會議的影響。在軍事上中央誠然獲得勝利，在政治上卻接受了反對派的主張

中原大戰與擴大會議，不足爲閻錫山病，亦不應由閻錫山一人獨負其咎，在中原大戰與擴大會議進行期間，中央雖對閻錫山及汪精衛、馮玉祥、李宗仁、白崇禧等予以開除黨籍，通緝拿捕之處分，但並無追蹤捕捉行動，以後又各委以重任，共同抗日，共同戡亂，舊事不再提起。這是蔣中正委員長偉大的地方，他一生沒有暗殺過一個政敵，所以在抗戰戡亂時期，閻馮李白都效忠於他，別而無二心。

集中力量準備抗日

民國十九年中原大戰後，閻錫山於廿年一月赴大連小住。廿年秋，突接家書，驚悉父親重病，閻氏為獨子，對父親的病繫念殷切，於八月五日經大同返五台鄉居，對父親侍膳問安。

九月十八日日本突襲北大營，佔領瀋陽。十月三日，國民政府決議改組山西省政府，請閻錫山推薦山西省政府委員人選。十月三日，山西省政府改組，閻錫山的舊屬重葦山西省政，徐永昌為山西省政府主席。

廿一年二月廿日，國民政府特派閻錫山為太原綏靖主任，總管山西綏遠兩省軍政，三月廿七日，閻錫山就任太原綏靖主任。典禮中作簡短講話，閻錫山語重心長地提到軍人應扮演的角色：「將來國家需要我軍人犧牲的時候，我當率領我武裝同志共同犧牲，以盡我軍人天職。」此後閻錫山站在民族國家統一的立場，於抗日戰爭、戡亂剿共，堅定赤誠，一心一德，擁護蔣中正主席。

閻錫山在東北棲息八個月，據其觀察所得，中日戰爭，終不可避免，於是在就任太原綏靖主任後，提出「守土抗戰」，「自強救國」口號，將全部力量，集中於準備抗日。同時認定經濟建設是充實財力的必要手段，於是又提出「造產救國」的主張，訂定「山西省政十年建設計劃」，分年按進度進行。除組織民衆，訓練軍隊外，於「守土抗

戰」極有關係的事項如：(一)修築由大同至風陵渡，一千一百餘里，縱貫山西南北，為山西經濟大動脈之同蒲鐵路。(二)修建日產五百噸之鍊鐵爐與日產二百五十噸之鍊鋼爐。(三)增強太原兵工廠之生產能力，投注心力，全心建設，以鞏固華北。

日軍蠶食鯨吞東北

日本於廿年九月十八日佔領瀋陽及奉天後，逐步侵略東北。廿一年三月九日偽「滿洲國」在長春成立，溥儀任執政，鄭孝胥任國務總理。偽「滿洲國」成立之後，日本又以錦州為中心，分南北兩路，積極佈置進攻華北。

日軍佔領長城各口岸及灤東各縣後，平津危急，人心惶惶。中央政府乃召開緊急會議決議：設立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以黃郛任委員長，宋哲元等為委員，要黃郛負對日交涉之責，期望華北危殆之局，稍告安定，俾可有充分時間，準備抗日。日方脅迫驕橫，態度惡劣，黃郛蒙誘辱，委屈應付，再三折衝，達成類似城下之盟的協訂，於廿五年五月卅日在塘沽簽訂「華北停戰協訂」。日方允許自冀東及長城各口岸撤兵，但撤退後，國軍不得進駐，由冀察政務委員會派保安隊維持秩序，中央在華北各機關，亦須南撤。日本之意，欲使冀察脫離中央成立華北自治政府，以期達成逐步分裂中國之目的。

意志堅定不受利誘

日本之願與中國簽訂停戰協訂，停止在華北用兵，並非放棄武力侵略，乃是要把重點放在推進對蘇聯的戰略準備，儘量用流血最少的方法，把華北變成「第二個滿洲國」。設置一位傀儡，由日本在背後控制的政府，進而迫使中國的南京中央政府，承認日本在華北五省（冀、察、魯、晉、綏）的指導地位。

日本首先利用失意的北方軍閥和政客，包圍閻錫山，以驅逐北平綏靖主任張學良為號召，擬於驅逐張學良後，在北平組織受日人操縱的偽組織，擁護閻錫山為首領。

廿一年春天，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字向方），派使者至太原，表示驅張擁閻誠意，並徵求閻的首肯，但為閻錫山所婉拒。閻在廿一年八月二日日記中，有以下的記述：

八月二日 日記—告韓使

今春韓復榘使人來云：欲共攻平津以驅張（學良），擁公再出，但須馮不加入，如何？余答：外禍方殷，豈可再生內訌，且山東已在日人虎視中，若此，正所以與敵以隙，國事更不堪問矣。使者曰：公如不以爲然，請爲向方守密。

日軍遭拒仍不死心

日軍於民國廿一年四月、五月、七月，

令段祺瑞三次派使者至山西，挽留驅張（學良）抗南（南京政府），主持北方軍事，均為閻所峻拒。閻錫山在廿一年七月日記中，作以下的記述：

七月 日記——與段使談

合肥使人來云：「北方軍人，均一致倒張，倒後段可收回東省，北方另成政府，以抗南，只俟公一諾。」余答曰：「未聞內亂愈張，而外患能息者，日強國也，不可測度，請段公勿受其欺。」此為四月間事。五月間，專使復來云：「願推公主持北方軍事以驅張，北方軍由段擔任，一致聽命。」余答以「十九年欲出洋息內爭未果，變為內戰，至今思及，尚為痛心，余豈肯再為內戰之發動者！合肥老矣！當此國難之時當局者有遺誤，元老當以原諒心理以國民資格扶助，裨益國家當為不少，請轉陳鄙意為盼。」使者遂返。又七月下旬由王議長寄語云：「外交內部均已辦妥。擬入宋哲元軍中，效馬廠誓師法，通電抗日驅張，只得公一諾，即行發動。」余曰：「外患已成，國固不幸，然負責有人，段公此舉，恐以救國之心，蒙亂國之責，老矣；不若靜心為愈，希轉達為盼。」

註：段祺瑞使者第一次來，在太原接見，不記姓名。第二次使者係王揖唐（段系要人，曾任安徽省長，抗戰勝利後以漢奸治罪），至河邊村西匯山莊晉見。王辭去，閻錫山曰：「這是另一種聰明人，讀書能詩，何

用！」（參見閻錫山年譜長編）

自從塘沽協定簽字後，日本在華北沒有大的軍事行動，但是卻利用日本浪人及中國流氓，到處滋生事端，擾亂治安，尤其對於製造漢奸組織，進行頗為積極。日本特別期待閻錫山來領導華北偽組織，閻錫山卻毫不動搖。

深明大義改寫歷史

對於閻錫山力拒日本之邀，不肯替偽政府效勞，忠心於國民政府的行為，當時蔣委員長一再讚揚閻錫山深明大義。蔣委員長在他廿四年六月下旬的日記中說：

「此際，日軍對於華北五省當政者的政治工作也還是進行得頗為起勁。

「日方所寄予期待的，是山西省的閻錫山。日方認為他是舊時代的軍閥，故而對之頗為看重。

「六月下旬，日本陸軍省擔當「滿蒙工作」的負責人前往閻錫山所在之地的太原訪問；其後，日本駐華大使館武官高橋坦以及在天津的支那駐屯軍幹部都曾陸續赴晉。可是閻錫山不僅沒有為他們所動搖，反而在報端發表公開信，將日本陰謀揭穿，並且更致函孔祥熙道出：看到來太原訪問的日本軍官所持軍事地圖，顯示日本最初只想利用黃河以北作為日蘇交戰時的補給基地，但現在已擴大及於長江以北地區。」呼籲中央提高警覺。

閻錫山雖然拒絕了六月下旬日本人的威脅利誘，但日本對他還是不死心，仍在繼續不斷地糾纏。

蔣委員長在他廿四年十月份反省錄中，記下左列兩點，讀後，閻錫山忠貞不二之心，昭然可知。

「一、日寇在華北策動五省自治獨立，必欲於六中全會（十一月一日—六日）或五大大會（十一月十二日—二十三日）時達成其目的，對各省主管威脅利誘，無所不至；魯（山東）韓（復榘）尤為動搖，而百川（閻錫山）則深明大義也。

「二、由川飛陝，豫入晉，訪問閻百川，商談國事；彼面允入京，參加大會，並表示拒絕「華北自治運動」，此實為華北局勢轉危為安之先著也。」

閻錫山深明大義，意志堅決，絕不作漢奸，對於中華民族的存亡續絕，關係非常重要。假如閻錫山就任日本擬議的華北五省自治政府的首領，則日本可以利用華北五省及東北的人力物力，再加上日本陸海空軍的力量，對抗並推翻南京的中央政府，以當時的情形，可以說是易如反掌。如此一來中國便無所謂八年抗日之戰，而中華民族也將被日本奴役，成為亡國奴，永無翻身之日了。

參考資料：

中外雜誌合訂本

蔣介石秘錄

閻錫山先生年譜長編初稿